

Symphonies of Life and Death

The Music World of Gustav Mahler

李秀军 著

生与死的交响曲

——马勒的音乐世界

生与死的交响曲
Symphonies
of Life
and Death

这是我国第一部从整体上认真审视和研究马勒音乐的尝试性著作。作者紧紧抓住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奥社会的特殊情势、艺术思潮及传统文化特征，特别是作曲家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路程，在这个基础上悉心阐述马勒音乐深层的精神内涵。这也是西方大量的马勒研究文献中，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

——音乐学家 于润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ymphonies
of Life and Death**

The Music World of
Gustav Mahler

李秀军 著

生与死的交响曲

——马勒的音乐世界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李秀军著. —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

ISBN 7-108-02259-1

I.生... II.李... III.马勒, G. (1860~1911)

—传记 IV.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4155号

生与死的交响曲 李秀军著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200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28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9.00元



目录

序 于润洋 / 6

孕育马勒的时代 / 8

一、暴风雨前的沉寂 / 10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 / 10
2. 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兴起 / 16
3. “遮蔽欧洲的阴影” / 21

二、深沉、神秘的宗教传统和理想 / 24

1. 德国神秘主义宗教传统 / 25
2. 道德神学与浪漫主义的宗教理想 / 27

1888年前的马勒 / 32

一、卡里什特、伊格劳的童年和梦的实现 / 34

1. 犹太宿命意识与志向 / 34
2. 不幸的童年经历 / 38

3. 遁逃与神童 / 41

二、维也纳的大学生 / 44

1. 教育与审美 / 45

2. 校外的世界及与布鲁克纳的友谊 / 49

三、《悲叹之歌》与早期的指挥生涯 / 54

1. 《悲叹之歌》——对恩斯特弟弟及不幸去世朋友的
悲痛和忏悔 / 54

2. 在单调的工作中“去经受磨难” / 62

四、《流浪少年之歌》与《第一交响曲》 / 67

1. 两部作品的创作经过与《第一交响曲》
的首演回顾 / 67

2. 艺术内容与特色 / 69

走向艺术的高峰 / 82

一、布达佩斯、汉堡的歌剧指挥
与阿特尔湖畔的作曲小屋 / 84

1. 橄榄绿的飘带 / 84

2. 施泰因巴赫的“夏天作曲家” / 88

二、《儿童的奇异号角》和
《第二交响曲》的创作经过 / 91

1. 无名音乐家 / 91

2. 艰辛的创作历程 / 98

三、《第二交响曲》
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色 / 102

德国神秘主义精神的感召 / 118

一、《第三交响曲》的创作经过 / 120

二、对叔本华与尼采的回答 / 125

1. 马勒的交响世界之梦与意志外化的启示 / 125

2. 叔本华与尼采的影响 / 128

三、《第三交响曲》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色 / 133

“十年战争” / 152

一、向宫廷歌剧院的进军 / 154

1. 锲而不舍的策略家 / 154

2. 逆境中的搏击 / 156

二、指挥家与戏剧家 / 161

1. “海格力斯之举” / 161

2. 指挥艺术与“分离学派” / 165

三、生与死的悲剧冲突 / 174

1. 风格的转变与《第五交响曲》的创作经过 / 174

2. 《第五交响曲》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色 / 177

3. 宿命的悲剧意识 / 189

四、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求 / 198

1. 盛大的慕尼黑集会 / 198

2. 《第八交响曲》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色 / 205

最后的岁月 / 216

一、远走他乡 / 218

1. 告别维也纳 / 218
2. 死亡的真实降临 / 225

二、孤独、悲哀和痛苦的人生依恋 / 226

1. 悲伤、忧虑的1908年夏 / 226
2. 《大地之歌》的艺术特色 / 228

三、《第九交响曲》的艺术特色 / 246

1. 主题与内涵 / 246
2. 新的风格艺术特征 / 248

马勒与未来 / 264

一、马勒对表现主义音乐的影响 / 266

二、马勒的世界性影响 / 276

1. 对前苏联交响乐的影响 / 276
2. 世界声誉 / 278

尾声 音乐历史长河中的马勒 / 284

国际国内马勒研究的历史

与现状回顾 / 294

附录 I

参考书目 / 302

附录 II

马勒的主要作品目录 / 306

附录 III

大事年表 / 310

后记 / 317

序

在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作曲家中,对其评价引起后人诸多歧义的并不是很多,马勒恐怕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在西方音乐学界不乏对马勒的音乐持极端否定态度的人。我就亲耳听到一位美国音乐学家轻率、断然地说马勒的音乐“不是真正的音乐”。音乐批评家们自然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位音乐批评家得出如此极端、刻薄的判断,按我的理解,其最根本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所谓“纯音乐”的标准看,蕴涵着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和体现着强烈的情感体验的马勒的标题性音乐,亵渎了音乐自身绝对的“美”;二是马勒的音乐风格、语言、结构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情势下已不合时宜。然而,同这种极端否定的态度相反,许多音乐学家、作曲家如勋伯格、贝尔格、布莱兹等,却认为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重要的作曲家,是20世纪音乐的精神领袖。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音乐学界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马勒热”的潮流,数量可观的研究马勒的著作和文献资料陆续出版。人们将目光转向了马勒,惊奇地发现了许多过去未曾注意过的东西,并重新估价马勒音乐的价值。但在中国音乐学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对马勒却未曾给予足够的关注。

李秀军君的这部专著《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这是我国第一部从整体上认真审视和研究马勒音乐的尝试,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部著作研究的重心侧重在马勒音乐的精神内涵方面,性质上偏重于社会学的视角和纬度。这个选题取向和论域是恰当的。作者紧紧抓住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奥社会的特殊情势、艺术思潮及传统文化特征,特别是作曲家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在这个基础上悉心地阐述马勒音乐深层的精神内涵。这也是西方大量的马勒研究文献中,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作者在研读了相当丰富的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勒音乐本身的实际感受、领悟和分析,阐述了他对马勒音乐中所蕴涵的内在精神和意蕴的理解。应该说,这部著作弥补了西方相关著作中在这方面的薄弱和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勒音乐实质的领悟和认识,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我相信,作者也一定意识到,这部著作所阐述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带有核心性的问题,但它毕竟不是马勒研究的全部。还有一系列相关课题需要着手研究,特别是继续深入到马勒具体音乐作品的本体中去,在这个层面上将研究深入下去,以进一步具体印证本书中已得出的结论。

本书的基础是作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地狱到天堂——马勒的人生与音乐作品精神内涵的再审视》,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这里面灌注着导师黄晓和教授的心血。在这本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也请允许我分享导师黄晓和教授的欣慰。

于润洋 2001年岁末于中央音乐学院

孕育马勒的时代

马勒的一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度过的，他的艺术活动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整个欧洲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深刻历史变化和动荡，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所论证的那样，任何一个欧洲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一动荡、巨变的历史洪流中。而这一动荡、巨变的历史特征是：“1914年以前所有欧洲的大国都处在侵略性的民族国家主义状态中”，“它们彼此冲撞、威逼、恐吓”，“而且趋向战争”。^{【1】}韦尔斯的这一论断，可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连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诸列强会议上得到很好说明。

19世纪末的欧洲各帝国主义列强国家，在帝国主义掠夺性的驱使下，重新开始了列强逐鹿的鬼把戏（这场强权旧戏，可以说一直热烈地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对整个世界领土的重新瓜分后，为了缓和各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霸权和掠夺殖民地所引起的尖锐矛盾，以及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1898年在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提议下，于荷兰海牙召集了由诸列强参加的一次国家间会议，以此来“谋求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战胜纠纷和不安的因素”。这样的会议，在1907年以更大的规模召开，几乎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都列席了。遗憾的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国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对

【1】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38章“近代帝国主义的浩劫”，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9、1162页。

国际法中涉及战争的诸点进行狡猾的争论,而把废除战争作为一种幻想搁在一边。”“它们想要的并不是终止以战争为其尖锐的国际间的竞争,而是愿意把正在变得太昂贵的战争搞得便宜一些。每个国家都想节省在次要的纠纷和冲突上的消耗,并建立起国际法,使得比它更厉害的敌人在战时感到为难,而不使自己感到不便。这些就是它们在海牙会议上所追求的实际目的。”^{【1】}海牙会议已不可能挽救帝国主义国家间尖锐冲突的历史命运,因为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因素和条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准备就绪,帝国主义国家间已失去了帝国概念与世界和平之间的最后联系。当时的欧洲各国,几乎都染上了帝国主义的热病,除我们已熟知的像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法国、英国等外,帝国主义精神也触动了巴尔干半岛,使得这些脱离奴役状态不到一百年的诸小国家开始流露出得意忘形的意象。效仿俄罗斯沙皇,就连保加利亚国王也采用了沙皇这一称号,梦想着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希腊帝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导帝国主义运动的欧洲各国政府,既是不合适的政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坏透了的体系。它们“经常在军人和官僚等级中,在有事业心和贪得无厌的社会阶层中,和在新金融界即大商人家中,找到它最坚强的支持;它的主要批评者是来自受教育的穷苦人,它的主要反对者是农民和劳动群众”。^{【2】}一句话,这种完完全全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与人民愿望背道而驰的政府,是注定要给整个欧洲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在众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是这种代表的最完整形式。

【1】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130页。

【2】 同上书,第1153页。

一、暴风雨前的沉寂

马克思指出：“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1】}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

以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势力，在镇压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使整个德意志完全恢复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它们对内倒行逆施，对外效仿沙皇俄国，为了彻底打死毒杀民族血液的革命细菌，保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动容克的绝对优势，一系列以迫害各种进步力量为主的反动法令被付诸实施。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气氛时写道：“生不能，死不得，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开店营业，不能上学，不能集会，不能建设工厂，不能迁移。不经当局许可，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做。”^{【2】}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反动的波拿巴式的专制主义，始终活跃在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气氛中。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发展和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兴起，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已为历史所不容。建立统一的德意志，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当时德意志的统一，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最终建立起代表人民意愿的民主共和国；而另一条是通过封建王朝的兼并战争，最终在统一的德意志中巩固起普鲁士容克的霸权。但是，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强烈要求统一的普鲁士资产阶级，放弃了与无产阶级一道“清除家里的王朝老爷们”的革命道路。与此相反，普鲁士封建统治阶级不要一个由它的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他们要的是由王室和外交行动统一起来的德意志。最终霍亨索伦家族利用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在反动容克代表俾斯麦的领导下，依仗他们的军刀开辟了统一的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72。

【2】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第95页，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

程。而“这就是为什么在德意志最后统一时，它对世界显示的不是一个近代文明民族的形象，而是这两撇可怕的小胡子、脚穿长统靴、头戴尖顶帽、腰挎军刀的颇有古风的俾斯麦的一张脸”。^[1]

统一后的德意志，充分保证了容克资产阶级的封建利益和专制统治。帝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联邦议会，实际上是普鲁士霸主的装饰。联邦议会的58个席位，普鲁士就占有17位，帝国的其余21个邦和3个自由市，只能分别得到1至6个席位，而每项议案只要有14票反对就会被否决。而各邦的议员均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帝国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命议会主席、召开和解散联邦议会。帝国国会是一个发表独白没有政府的议会，它不能行使它的基本职能，不能通过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在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没有任何发言权，也不能擅自罢免和监督宰相，它的惟一职能就是通过预算。而在德意志帝国中真正具有权利和影响力的是不受宪法任何约束、直接效忠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军队。因为“德意志帝国是由旧普鲁士军事君主国的军队缔造的。……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工具，在极大程度上又是保卫它的工具。在这整个时期，普鲁士军事邦以其具有的一切特点……它的保王主义贵族传统，它对组成军官团核心的那些社会阶级的偏爱……一直是国内政策的最坚强的枢轴，同时又是整个堡垒中的坚固堡垒”。^[2]总之，从表面上看德意志帝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实际上“君主”是实，“立宪”是虚。政治联盟中虽有资产阶级的席位，但容克地主阶级始终是德意志帝国中的主要力量。因此，从本质上说，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象粉饰门面、混杂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3]

这种波拿巴式的集权统治，鲜明地体现在德意志帝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上。1878年，面对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俾斯麦不顾帝国国会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利用这个“非常法”，俾斯麦大施波拿巴专制主义的淫威。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大兴冤狱、逮捕、监禁、判刑、流放、驱逐。在这项法令实施的12年中，近150种报刊、1300种出版物被查禁，330多个各种工人组织被取缔和解散，有900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1500多名被逮捕并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徒刑。在

【1】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075页。

【2】 迈内克：《世界公民和民族国家》，第527页。

【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

威廉二世统治期间,他更是把以迫害社会民主党为主的白色恐怖推向极致,他说“只有首先取缔社会民主党人,加以斩首,必要时进行血洗,使其不能危害,然后才能进行战争”,“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流放到加罗林群岛的法令”。^{【1】}为此他公开号召帝国各邦为制定“苦役监禁法案”积极献策。更加严格的限制政治性结社和集会。赋予警察和军队广泛的权力。

与这种波拿巴专制相伴随的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人被有条不紊地灌输一种大日耳曼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和战争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理论。与19世纪上半叶许多失去独立的国家为了本民族的独立、统一所倡导和追求的民族思想不同的是,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主张一个强大而先进的民族,被认为有权去统治和征服其他弱小的、落后的、政治上不发达的民族,有权去拯救民族性尚未发达或低劣的民族。而这些被征服和受到统治的民族应表现出对它们的期待和感激之情。这个强大而先进的民族就是德意志,因为德国人不仅是“社会的精华”(威廉二世语),而且“德国和它的皇帝是一个空前显赫卓越的东西,是在世界诸劣等——天赋不足的——民族中的一个‘披着闪亮的甲冑’、挥舞着‘上好的德国宝剑’的天神般的国家”。^{【2】}

民族沙文主义思想被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在整个欧洲传播着。1908年以前,鼓吹民族沙文主义的“泛德意志协会”已达27个,遍及整个欧洲。其中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地协会、国际协会、青年德意志同盟等都是它的下属组织。两个最大的传播中心是在德国和奥地利。(1907年至1913年,希特勒不是在德国,而是在维也纳强烈地受到泛日耳曼思想和反犹主义浪潮的影响和教育。而正是在1907年,古斯塔夫·马勒在泛日耳曼和反犹主义浪潮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辞去了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

泛德意志协会的成员大多来自上层资产阶级、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大垄断资本家、议员、律师、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大学教授、主要报刊的主编和编辑等,几乎遍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主张世界上所有的德意志人应组成一个庞大的德意志国家,去统治和领导世界,为此他们极力支持德意志帝国在海外的扩张政策。当时德意志

【1】 转引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第201、202页。

【2】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134页。

帝国中的各主要报刊如《每日展望》、《德意志报》、《莱比锡最新消息报》等，都顺应泛德意志的潮流，大肆鼓吹、连篇累牍地刊登宣扬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文章。瓦尔特·拉特瑙在《复仇女神的蒙难者》中写道：“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没有让最优秀的民族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是很不公平的”。^{【1】}为了达到对世界的统治，承担起对世界的支配责任，德国人就准备战争了，战争不仅被认为是不可避免，而且在战争中这个优秀民族的各种特性才能被鲜明地揭示出，“如果忘记了如何去作战而期待人类有大成就（甚至就算有任何成就的话），那都是完全的幻想和美丽的情操而已。直到现在还没有其他办法能像一场大战那样，使这些力量如此有力地行动起来；这就是那种在营垒中产生的犷悍的精力，那种从憎恨中产生的深刻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精力，那种从杀害和冷酷无情产生的不自愧的良心，那种在努力消灭敌人中产生的热情，那种不顾损失自己和同胞的生存、傲视一切的无情，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生命力时所需要的那种地震般的灵魂的振动”。^{【2】}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这段话，始终被认为是他们的历史教诲。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这些思想，霍亨索伦王朝甚至不惜败坏教育、篡改历史，让这些充满热情和朝气的青年人始终陶醉在比其他的民族在各方面都强盛的优越感中。从这种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要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对其他民族将要采取什么样的压迫手段，并把统一不久的德国推向何方就可想而知了。

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在其长达640年的统治中，奥地利并不是主要凭借武力，而是通过与别国签订条约和联姻来获得大片土地。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民间谚语把奥地利的领土扩张方式说的很形象：“战争让别人去打，你，幸福的奥地利来结婚吧。”

然而从19世纪开始，哈布斯堡王朝面对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觉醒，露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来面目。梅特涅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奥地利获得了由“警察和特务”组成的国家的“美名”，对此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奥地利是所有封建国家中封建意识、宗法

【1】 转引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第217页。

【2】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134页。